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墨西哥政治的影響—國際政治經濟學之解析—

NAFTA's Impact on Mexican Politics: An IPE Analysis

doi:10.30390/ISC.199703_36(3).0005

問題與研究, 36(3), 1997

Issues & Studies, 36(3), 1997

作者/Author：向駿(Antonio Hsiang)

頁數/Page：91-9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7/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3_36\(3\).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3_36(3).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對墨西哥政治的影響 —國際政治經濟學之解析—

向 駿

(美國克萊蒙研究院政治系博士班研究生)

摘 要

冷戰結束後，全球經濟之區域化促使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加入自由貿易協定固可提升墨國經濟之國際競爭力，但貿易自由化也改變了墨國數十年來穩定的經濟利益平衡，而這種轉變正強烈地衝擊著其政治結構。公元二〇〇〇年墨西哥總統選舉之結果將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墨西哥政治生態的影響提供最佳的指標。

關鍵詞：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墨西哥、政治發展、經濟發展

* * *

壹、前 言

冷戰結束所引起世界格局之劇烈變化對各界產生不同之衝擊，其反應亦因影響層面之大小不一而足。由於冷戰結束提供學者很多冷戰期間未曾出現的事例，因此學術界之反應亦頗為熱烈，「後冷戰」幾乎成了政治經濟學有關文獻中不可或缺之詞彙。蘇聯解體後，國際關係之舊格局隨之崩潰但新格局又未成形，政治經濟學者遂紛紛使出渾身解數分析、探討、預測新格局之未來走向，以便盡早形成一家之言。綜觀年來世局之演變，就軍事層面而言，超強對抗的緊張氣氛銳減，但區域性有限度的武裝衝突卻因民族主義的興起而陡增。就經濟層面而言，市場經濟雖成為大多數國家追求的目標，但自由貿易卻僅在區域內穩定發展。就政治層面而言，民主化運動取代意識形態對抗成為大多數國家改革的方向。不論後冷戰將以「單極」或「三極」取代冷戰期間之「兩極對抗」，美國國際地位之重要性均不容置疑。「如果說，美國為加強自己的競爭地位而有必要組成本地區（拉丁美洲）的經濟集團的話，那主要是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①然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在提升美國經濟競爭力的同時，

註① 蘇鎮興，「關於美洲自由貿易區若干問題的探討」，拉丁美洲研究（中國大陸），第九十七期，一九九六年八月，頁二～三。

對墨西哥政治生態也產生了不小的衝擊，對墨西哥的民主化更起了相當程度的催化作用。本文試就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分析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如何透過自由市場提升墨西哥的政治開放並討論其邁向民主化之可能發展。

貿易與民主的關係在政治經濟學上有兩種不同的看法。第一種學派認為貿易與民主係「正」相關：即貿易愈開放民主也愈進步。第二種學派認為貿易與民主成「負」相關：即貿易開放會阻礙民主的成長。第一種學派的推論乃植基於所謂的「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所謂「比較優勢」在經濟學上係指由於各國具備之生產要素不同，一國將生產、出口相對價格高的商品而進口相對價格低的商品以獲取最大的貿易得利(Gains From Trade)。國際貿易的不可避免乃由於「比較優勢」的無所不在。此一學派認為國際貿易會提升經濟自由，進而導致資本、科技、信息的互通有無，乃至思想、觀念的相互激盪。凡此種種均將加速民主的成長。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和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共同出版的一九九七年經濟自由指標(1997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一書中的統計資料顯示，經濟愈自由的國家其成長率愈高。②而尾隨經濟成長的利益分配往往導致政治上的開放競爭。因此，貿易與民主係正相關。第二種學派則認為由於政府介入貿易(如關稅的訂定)乃不可避免，人民的自由實因貿易的發生而不得不有某種程度的犧牲。此一學派更認為由於國際貿易一直被視為「經濟成長的引擎」，而經濟成長又往往被百姓視為施政成敗的重要指標。因此，非民主政府可借由國際貿易所產生的經濟成長而提升其政權的合法性。智利皮諾切(Agusto Pinochet)政權(1973~1990)被此一學派視為兩者為負相關的最佳範例。不論貿易會提升或阻礙民主的成長，兩者之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當為不爭的事實。以下將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分析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如何影響墨西哥的政治生態，內容將包括緣起、演變、衝擊、結論等數節。

貳、緣起

包含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國的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形成有國際及國內兩個層面的因素。國際因素中最重要者為前蘇聯之解體及冷戰之結束。國內因素中就墨西哥而言，最重要者為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瓶頸之急需突破。冷戰時期的美蘇兩極對抗由於前蘇聯之解體而結束，而軍事對壘的降低則導致後冷戰時期全球資源的重新配置。此一轉變以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三分天下」的說法形容得最為貼切。她在一九九〇年的經濟高峰會中就曾指出世局中之三大集團國家乃分別植基於美元、日圓和馬克。③面臨此一轉變，美國急欲建立其獨霸世界的企圖不難想見。然而就其歐洲盟邦而言，法國長期以來即思獨領西歐，欲驅美國勢力於歐洲之外而

註②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6, 1996, p. A16.

註③ Terry L. Deibel, "Strategies before Contain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 4 (Spring 1992), p. 101.

後快；統一的德國更欲借蘇聯解體及冷戰結束的大好機會擺脫戰後以來美國的枷鎖；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員國而言，對美國之依賴更因軍事威脅的消失而一落千丈。就其亞洲的經濟夥伴日本而言，「美國基於種族理由，在經濟上不願與日本人聯手。」^④復以日本自八〇年代起即因其強大的經濟力而使美國有羽翼漸豐不聽使喚之感，而其國內右翼團體所具備的政治影響力更使美國懷疑日本的忠誠度及可信度。因此，與其捨近求遠不如就美洲本土尋求新的地緣經濟盟友。北邊的加拿大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已和美國簽訂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可視為現成的盟邦。南邊的拉美地區傳統上雖為美國的勢力範圍，然或因經濟規模太小無實際結盟的價值，如中美洲諸國；或因部分國家已另起爐灶結為區域性的經濟體，如包括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及巴拉圭等國之南錫共同市場（Merco Sur）；或因歷史情結難於短期內改變其外交政策，如墨西哥。墨國歷來即「強調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在可能情況下，在外交政策方面與美國保持相當的距離，對美國之立場或不關心、或反對。」^⑤幸因一九八八年底就職的薩林納斯（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總統乃少見的親美人士，提供了美國難得的機會，得以和墨西哥結為新的經濟盟友，以與歐體、日本及隱然成形的東亞經濟集團分庭抗禮。

薩林納斯總統個人的親美情結雖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得以簽訂的重要原因，但決非唯一的原因。更重要的因素是墨西哥的經濟狀況已惡化到不下猛藥不足以療傷的地步。「進口替代既呈停滯局面，若不將其基本的工業化戰略做大幅修正，補救政策縱使可治標，畢竟難以治本。」^⑥因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得於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簽署，而於一九九四年元旦起生效。

如同拉美地區其他主要國家，墨西哥自一九二九年「經濟大蕭條」後即被迫推動工業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更因美國工業產品供給不足而加速進口替代工業化的腳步。由於對本國初級工業的保護為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初期所不可避免，因此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不斷高築。以墨西哥為例，除關稅節節上升外，非關稅壁壘亦然。受進口許可證限制的商品自一九五六年的二五%增高至一九六五年的六〇%，至一九七五年高達一〇〇%。為了加速發展製造業，大量的國家資本被投入所謂的「戰略性」工業。據統計，一九四〇至一九七五年期間，墨西哥的公共投資始終維持在投資總額的四〇%左右，一九七三年更曾高達四五·六%。^⑦然而長期依賴保護政策和豐富的天然資源卻造成墨西哥產業無法面對國際競爭的壓力。

拉丁美洲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模式在六〇年代所謂的「黃金時期」，雖取得了明

註④ 陳超雄，「美、加、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經緯」，美國月刊，第七卷第八期，民國八十一年八月，頁八五。

註⑤ 柯玉枝，「美墨經貿關係（上）」，美國月刊，第八卷第八期，民國八十二年八月，頁七九。

註⑥ 宮城和宏、董宜嫻，「中華民國與墨西哥經濟發展策略之比較」，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三卷第四期，民國八十三年四月，頁四八。

註⑦ Miguel D. Ramirez, "Mexico'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1950~85: Lesson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Vol. 28, No. 2 (Summer 1986), p. 46.

顯的成效，但也招來不少的批評。以依賴理論為代表的左翼人士認為，由於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過程中過度依賴外國資本，拉美不僅沒有減少對外部世界的依附，反而陷入更嚴重的依賴。以新古典主義為代表的右翼人士則認為，只有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國際專業化和公平的貿易往來才能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化；而進口替代工業化賴以生存的各種保護政策卻使貿易產品的國內價格背離國際價格，導致資源配置出現扭曲。^⑧以墨西哥為例，自一九七〇年代起雖然改善了過度保護政策並試圖推行出口導向政策，基本上還不能將進口替代成功地轉換成出口導向。這可由進口替代效果明顯降低而出口擴大效果並無顯著上升得到證明。其主要原因是墨西哥產品因外銷補貼過多而喪失了競爭力。^⑨脆弱的產業結構經過兩次能源危機的蹂躪後，終於導致墨西哥經濟一蹶不振，直到一九九二年其國民所得仍停留在一九八〇年的水準。

叁、演 變

羅高斯基 (Ronald Rogowski) 曾就歷史的角度分析對外貿易如何影響著國內政治聯盟的形成。羅氏認為對外貿易開放的程度會影響國內生產要素 (資本、勞工、土地和技術) 所有權人之間的利益分配，進而導致政治聯盟的變化。^⑩賀爾普曼 (Elhanan Helpman) 更進一步以數學實證出國際間貿易政策的形成與國內利益團體的政治行為確實有著緊密的連繫。^⑪本節將分析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墨西哥政治生態所帶來的轉變。

墨西哥之得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乃自八〇年代初起一連串經濟開放政策的結果。所謂「開放」係指一國經濟 (以其製造業及出口業為主要檢視對象) 對外貿的承受性 (receptivity)，其程度的指標包括出口與國民生產毛額之比，進口與國民生產毛額之比，和總貿易量與國民生產毛額之比。比例愈大則表示該國經濟愈開放。^⑫事實上，德拉馬德里 (Miguel de la Madrid Hurtado) 和薩林納斯兩任總統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訂前的十年經濟改革已造成墨西哥經濟結構快速的轉型。德拉馬德里總統任內兩項重要的經濟政策是：繼續償付外債並透過談判解決債務危機；採取自由市場經濟策略並促進出口。^⑬而他對墨西哥經濟最大的貢獻則在主導該國於一九八六年

註⑧ 江時學，「拉美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模式的演變」，*拉丁美洲研究* (中國大陸)，第九十七期，一九九六年八月，頁一一。

註⑨ 結構變化詳見宮城和宏、董宜嫻，「中華民國與墨西哥經濟發展策略之比較」，*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三卷第四期，民國八十三年四月，頁五四～五五。

註⑩ Ronald Rogowski, "Political Cleavages and Changing Exposure to Tra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1, No. 4 (December 1987), pp. 1121~1137.

註⑪ Elhanan Helpman, "Politics and Trade Policy," *NEBR Working Paper* 5309, October 1995.

註⑫ Lewis W. Snider, *Growth, Debt, and Politics: Economic Adjustment and the Political Performanc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p. 159.

註⑬ 鄧中堅，「墨西哥民主化的發展」，*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五卷第七期，民國八十五年七月，頁九四。

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儘管加入關貿總協並未能使墨西哥的經濟起死回生，但象徵了墨西哥經濟開放的開始，^⑭進而迫使墨國的經濟改革因受該協定之規範不得不繼續下去。更重要的是迫使其國內產業面對較公平的遊戲規則和較大的國際競爭。事實上就其產業結構而言，此一經濟改革確實取得某種程度的效果：其製造業產品出口比例由一九八二年的百分之十四提升至一九八九年的百分之五十五即為明證。^⑮

薩林納斯總統上任後，一方面由於其個人的親美情結和他所具備的經濟官僚技術，另一方面由於國內政治生態因經濟自由化產生的轉變方興未艾，改革步調得以加速，改革範圍得以擴大。他在繼續克服通貨膨脹、解決外債危機的同時，採取根本性改革策略，進一步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實行私有化，建立外向型經濟，大力引進外資，而其終極目標即為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與國際經濟接軌。如此大規模的經濟自由化迫使私人企業就改變中的成本效益作新的取捨（trade-off）。其結果是不少進口競爭工業（import-competing industry）轉型為出口導向工業（export-oriented industry）。然而由於相當部分已私有化的企業經營管理差、效益低的狀況並未改變，加上進口商品的競爭，國產商品的市場日益萎縮而大量破產。據墨西哥官方統計，僅一九九三年就有五千家中小企業倒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簽訂更迫使墨西哥的經濟改革繼續深化而踏上不歸之路。^⑯下節將分析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帶給墨西哥政治結構的衝擊及其可能的發展。

肆、衝 擊

外貿自由化對經濟發展最大的貢獻之一在於提供競爭機制並減少業者的尋租（rent-seeking）行爲。外貿開放後，生產不再僅以國內業者為競爭對手，產品改以世界市場為基礎而直接面對國際競爭，接受國際消費者的檢驗。因此，外貿自由化可促進國內產業研發技術，改善管理，提高生產，增強本國產品的競爭力，從而增強國民經濟活力，加速現代化的進程。^⑰墨西哥經過德拉馬德里和薩林納斯兩任總統的銳意改革後，在一九九四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正式生效之時已建立了西方式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以國營企業為例，其變化之大即非道里可計。國營企業總數由一九八二年的一一五五家降至一九九三年的二一〇家。（詳見圖一）然而由於墨西哥與美國、加拿大的經濟規模及發展程度均有極大差距，自由貿易區的發展不但使墨西哥的生產者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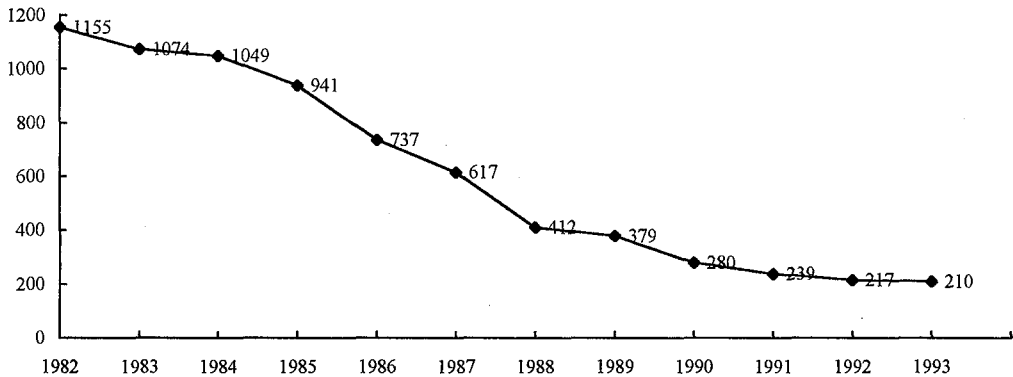
註⑭ Jorge Buendía, "Economic Reform, Public Opinion, and Presidential Approval in Mexico: 1988~1993,"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9, No. 5 (October 1996), p. 568.

註⑮ M. Delal Baer,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4 (Fall 1991), p. 133.

註⑯ Aaron Tornell, and Gerardo Esquive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xico's Entry to NAFTA," *NBER Working Paper 5322*, October 1995, p. 1.

註⑰ 楊西，「對拉美國家外貿制度改革的比較思考」，*拉丁美洲研究（中國大陸）*，第八十九期，一九九五年四月，頁四七。

圖一 國營企業數量變化



資料來源：Unidad de desincorporación (Mexico City : SF y CP, 1992) ; Banco de México, Indicadores Económicos. (Feb. 1995)

臨比美國生產者更高的經濟成本，同時也使墨西哥付出更大的社會成本。

大批國營企業私有化雖然提高了競爭力、吸引了外資、加速了成長率，但實施過程中也提供了不肖官員更大的活動空間和更多蠶食社會的機會，而貪污腐化更加劇了貧富不均和社會動亂。根據研究，貪污會減少投資進而降低成長。^⑧另有研究指出，貧富不均會引發政治不安進而減少投資。^⑨一旦投資降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墨西哥經濟貢獻的機制即功能大減。據國際透明化組織^⑩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的統計資料顯示，墨西哥貪污腐化的程度被列為全球第十七名，在拉丁美洲國家中僅次於委內瑞拉 (第七名) 和哥倫比亞 (第十三名) 而緊隨巴西 (第十五名)、厄瓜多爾 (第十六名) 之後。^⑪以社會動亂的現象觀之，根據風險控制集團 (Control Risks Group Ltd.) 統計，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六年期間，墨西哥境內的外國人或本國知名人士遭游擊隊、罪犯綁架或被擄為人質數居拉丁美洲國家之第三位 (僅次於哥倫比亞和巴西)，高達二百六十二人。^⑫洛杉磯時報對一九九六年的墨西哥市治安狀況曾有頗為傳神的形容：恐懼的一年。(詳見圖二) 事實上，外國直接投資因貪污和社會治安不良已由一九九五年的七十億美元降至一九九六年的十億美元。^⑬

更令人擔憂的是原已貧富兩極化的社會分配更趨惡化。一九七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顧志耐 (Simon Kuznets) 認為經濟發展與個人分配有 U 型的關係，即在經濟

註^⑧ Paolo Mauro, "Corruption and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1995, pp. 681~711.

註^⑨ Alberto Alesina and Robert Perotti,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nvest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0, No. 6 (June 1996), pp. 1203~1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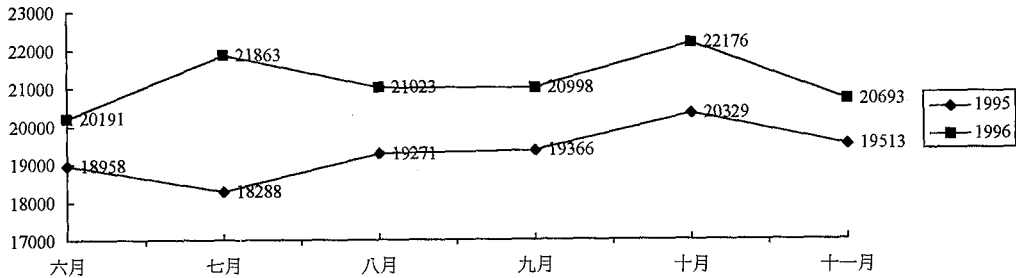
註^⑩ 該組織係由世界銀行前主管 Peter Eigen 於一九九三年創立。

註^⑪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 1997, p. A6.

註^⑫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 1997, p. A8.

註^⑬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1997, p. C13.

圖二 墨西哥市罪案數比較



資料來源：Los Angeles Times, Dec. 15, 1996, p. A14.

發展的初期個人收入不平等現象明顯加劇；隨著經濟發展的擴張，收入不平等的狀況會逐漸改善。然而此一根據西方已開發國家經驗所獲得的結論並不足以解釋開發中國家的實情。拉美國家的發展歷程顯示，經濟的發展不會自動帶來收入的公平分配和貧困現象的紓解。拉美國家經濟成長的利益也沒有自動地向極端貧窮的人口擴散，相反地，普遍出現「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現象。^②就基尼指數（Gini Coefficient）而言，墨西哥的數值自八〇年中期後即高居拉美主要國家的第二位，而自〇·五五向〇·六〇挺進。^③就都會區而言，其最富百分之十和最貧百分之四十的收入比值由一九八四年的五·一惡化至一九九二年的八·四。^④根據富比士（Forbes）雜誌的統計，墨西哥被列為世界五百首富者於一九九〇年僅有二人，一九九三年有十三人，一九九四年增至二十四人。以上數據在在顯示墨西哥的財富分配在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的過程中有惡化的趨勢。

基於以上種種經濟現象的變化，墨西哥的政治生態亦因發展政策之改變，自八〇年代中期開始逐漸轉型。選民依附於執政黨，而執政黨以物質、實利交換選票的侍從制度（clientelism）^⑤因經濟開放、貿易自由而逐漸腐蝕。革命建制黨（PRI）不再「一黨獨大」，其總統候選人不再高票當選（詳見圖三），地方選舉也不再每選必勝。選民的動向日益難以掌握，在野黨勢力日益壯大，執政黨內保守與改革之派系鬥爭也日益加深，而「其內部的鬥爭與自由化的發展有著很高的關聯性」，^⑥因為貿易自由

註② 袁東振，「淺析拉美經濟發展與社會公正的關係」，拉丁美洲研究（中國大陸），第八十九期，一九九五年四月，頁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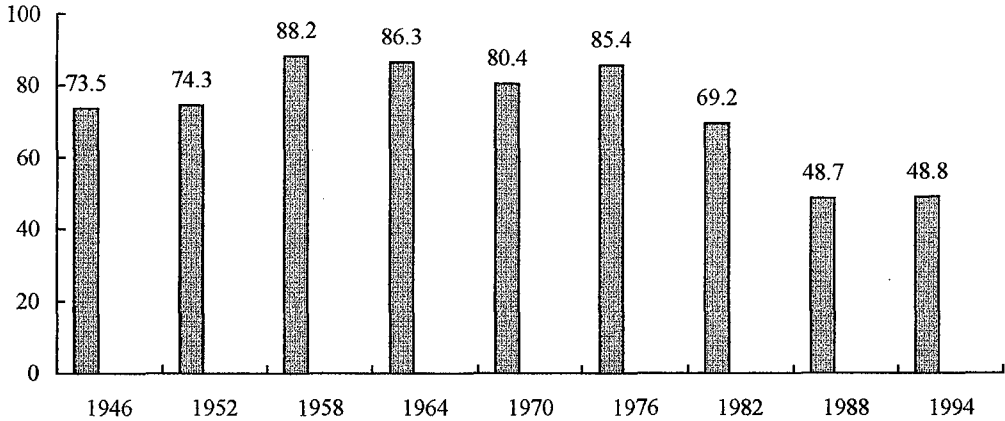
註③ 基尼指數以〇至一為區間，數值愈小表社會財富分配愈平均。詳見 Oscar Altimi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Equity: 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Vol. 38, No. 2/3 (Summer/Fall 1996), p. 48.

註④ 同註③, p. 45.

註⑤ Jonathan Fox, "The Difficult Transition from Clientelism to Citizenship: Lessons from Mexico," *World Politics*, Vol. 46 (January 1994), pp. 151~184.

註⑥ 鄧中堅，「墨西哥民主化的發展」，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五卷第七期，民國八十五年七月，頁九七。

圖三 墨西哥歷任總統得票率 (1946~1994)



資料來源：Comisión Federal Electoral (1946~1988)；Instituto Federal Electoral (1994)。

化對經濟成長的利益有重新分配之作用，而執政黨內部之鬥爭即源自於對此重新分配利益的競逐。各種跡象顯示，自一九二九年執政迄今未曾中斷的革命建制黨，因經濟的開放，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政治挑戰，甚至有政權移轉的可能。

所謂「政權改變」(regime change)，根據馮毅的定義可區分為以下三種。「非常規改變」(irregular change)係指國家統治權的轉移以法律外的方式完成，如軍事政變；「主要常規改變」(major regular change)係指不同政黨間以合於法律程序的方式所完成的國家統治權轉移，如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之交替執政；「次要常規改變」(minor regular change)係指同一政黨內以合於法律程序的方式所完成的國家統治權轉移，如墨西哥近七十年來均由革命建制黨執政。^②其中「主要常規改變」的定義與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對「民主化」的定義頗為相似。杭廷頓所謂的民主化係指以自由、公開和公平選舉產生的政府取代另一個不以此種方式產生的政府。^③從近年來各項選舉結果來看，執政的革命建制黨得票率是每下愈況，而主要反對黨國家行動黨(Partido Accion Nacional, PAN)，在一九九五年底曾有治理超過全國三分之一人口的記錄。^④最近的民意測驗更顯示，將於今年六月首次舉行的墨西哥市長選舉，執政黨勝選的機會並不樂觀。而去年底執政黨前黨魁(Santiago Oñate)之辭職及超過六千名黨工、幹部之宣布脫黨，^⑤更顯示執政黨內部之凝聚力正嚴重腐

註② Yi Feng, "Democracy,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7 (1997), forthcoming.

註③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 9.

註④ Wayne A. Cornelius, *Mexican Politics in Transition: The Breakdown of A One-Party-Dominant Regime* (San Diego: Center for U.S.-Mex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6), p. 8.

註⑤ *La Opinión*, January 1, 1997, p. 1A.

蝕中，短期內若無有效的整合行動，墨西哥市長選情極可能引發更大的分裂。

總之，墨西哥十多年的經濟改革開放使其社會力得以充分釋放。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非但直接衝擊其產業結構，更使業者之生存依賴國際競爭規則的程度增加，依附於執政黨恩給的程度減少。這種遊戲規則的改變，導致以往威權式的統治不得不以服務式的領導代之。否則，公元二〇〇〇年的總統選舉極可能使執政七十年的革命建制黨淪為在野黨。

伍、結 論

發展政策含有很高的規範涵意，不同的政策對利益分配的影響有巨大差異。按照制度經濟學的定義，制度就是規範。由於發展政策是指導長期發展的規則，所以政策變化即含有制度變遷的功能。④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為墨西哥政府多年來處心積慮改變其發展政策的具體成果，因此亦具有制度變遷的功效。然而，唯有「伴隨政治調整的經濟調整才會有較大的成功機會。」⑤

墨西哥欲藉貿易自由化改變其產業結構進而提升競爭力的理想，其之得以具體化有國際及國內的因素。前者為前蘇聯解體及冷戰結束後的美國不得不與拉美合作以與歐盟及亞太經濟體抗衡，進而建立其獨霸天下的局勢。「在全球經濟區域化的趨勢下，加強與美洲地區國家的經濟關係，將是美國是否能在二十一世紀繼續立足國際舞臺，擔任重要角色的主要因素之一。」⑥後者乃因墨西哥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之瓶頸始終無法突破，而不得不以出口擴張發展模式代之，而出口擴張又非美國之廣大市場難竟其功。墨西哥以一個開發中國家透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加入國際市場體系，面臨了經濟和政治雙重的衝擊。就經濟面而言，墨西哥的產業結構因面對較大的國際競爭而不得不作相當程度的調整。就政治面而言，如何使更多的人分享經濟成長的利益將是改革開放成敗的重要關鍵，因為貧富不均的發展政策終難獲得百姓的支持。再者，由於其政策影響將擴大到與自由貿易有關的各種外國利益團體，這種宏觀經濟環境的改變勢將導致政治體制的轉型。未來新制度設計的公正性、周延性、可行性均將接受更嚴格的監督和考驗。而公元二〇〇〇年的墨西哥總統選舉結果將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墨西哥政治的影響作最佳的見證。

*

*

*

註④ 賈根良，「拉丁美洲的發展政策與收入分配」，拉丁美洲研究（中國大陸），第八十九期，一九九五年四月，頁四五。

註⑤ Lewis W. Snider, *Growth, Debt, and Politics: Economic Adjustment and the Political Performanc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p. 219.

註⑥ 柯玉枝，「美墨經貿關係（下）」，美國月刊，第八卷第九期，民國八十二年九月，頁六三。